

守正创新 资政育人

——新中国70年历史学的繁荣发展

张海鹏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历史专门问题的研究与争鸣，实际上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关于唯物史观的大学习、大讨论。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在我国历史学研究中得到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历史学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历史学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我国历史学工作者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主义萌芽、农民战争、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阶级斗争与历史主义、民族英雄与爱国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都曾经引起热烈的学术争鸣。这些争鸣都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提出的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涉及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研究中国历史分期、如何用阶级观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如何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杰出人物的历史地位等。比如，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主要讨论中国的封建社会何时开始。不管是提出西周封建说、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还是提出魏晋封建说，都是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出发的。相关争鸣大都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依据中国历史典籍，在引经据典中展开自己的分析，各自立说。这些历史问题本身就极为复杂，不同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理解程度不同，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理解程度也不一样，形成不同的认识是很自然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的热烈讨论，源于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相关讨论持续3年之久。这次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唯物史观、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关于历史专门问题的研究与争鸣，实际上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关于唯物史观的大学习、大讨论。争鸣之中或许有偏颇，但这种通过史学争鸣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唯物史观的方法效果十分明显，一大批历史研究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在这个时期，老一辈史学家推出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如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范文澜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一大批年轻的史学家也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刘大年的《论康熙》、丁名楠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等。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研究机构的健康是我国历史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其所属的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等研究历史的专业学术机构先后建立起来，经济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也都有专门研究历史的研究所。一大批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聚集到这些研究机构，形成了我国历史学研究的专门队伍。1977年5月，党中央决定把中国科学院设置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出来，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四个历史方面研究所的队伍迅速扩大，后来还成立专门研究我国边疆地区历史的机构——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在已经发展为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社会科学院，都设有专门研究历史的机构。在高校，综合大学和师范学院普遍设立了历史系（院）。高校历史学教师不仅担任教学任务，大部分教师还承担科研任务，极大推动了历史学的繁荣。此外，党校系统、军队系统、地方志系统等也都设有研究历史的机构。

发源于1949年7月、成立于1951年7月的中国史学会，为团结全国史学界、推动我国历史学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大型中国近代史料，陆续出版了由各方面专家主持编辑的近代史系列资料。

我国历史学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历史学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可谓根深叶茂、史苑繁荣。

改革开放后，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至于各具体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法律、军事、民族、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大量论著问世。以中国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例，就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

这一时期我国历史学的发展成就，还体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了新突破。比如，改革开放后学者们根据大量考古发掘成果，并结合文献史料研究，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取得亮眼成绩。一些学者根据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把中华文明起源概括为“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再如，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概念发生重要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现代史。还如，我国学者在创建世界历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吴于廑提出世界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这一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使我国历史学工作者与其他国家历史学者有了广泛接触，各种国际性学术讨论对于我国历史学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出席了1980年及以后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15年还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改革开放后国家建立学位制度和博士后研究制度，培养了大量具有相当学术基础的历史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满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史学人才的需求，也为历史学研究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历史学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从中受益。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扩大，历史学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获得资助。国家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历史学发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

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例如，2002年国家启动清史纂修工程，集中政治史、军事史、边疆史、民族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学史、文化史等领域的老、中、青三代清史专家共襄盛举。在清史纂修过程中，还整理了数量庞大的档案史料和文献资料，编纂出版了“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等丛刊。大量档案史料和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对于培养青年历史研究工作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国家强大实力的支撑，这些重大工程是很难开展的。

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不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研究。习近平同志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2019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希望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要“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这些重要指示精神，关键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是新时代我国历史学发展的关键，是新时代赋予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大量翻译、引进西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在研究历史时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开展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学术研究和评论。这种引进和借鉴，对于打开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眼界、拓展我国历史学研究领域、丰富我国历史学研究方法是有益处的。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理论我们可以参考，但切不可作为自己研究的准绳。我国历史学发展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植根于我国史学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这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历史学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我国历史学工作者绝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探究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究竟有何相同、有何不同，探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通过历史研究为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历史根据。我们要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写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传承，或用文字记载，或以神话和传说等方式口头传承。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数千年来，历代史家为记述和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不懈努力，留下了珍贵的学术遗产。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深入研究历史，其中也包括推动我国考古学发展。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利用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研究历史。考古学研究人类过去的历史，探讨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特点与规律，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借鉴。考古学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研究，只有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才能不断深入。可以说，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推动历史学发展的两个车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考古学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学科；考古学是一个交叉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与自然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学科；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和解释的多样性，决定了考古学更加需要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更加需要严谨科学、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学风与学术精神；考古学的研究区域和内容既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又往往具有国际性，适于开展国际交流；考古学的研究年代虽然非常久远，但与当今时代又密切相关，在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古城保护利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我国生态环境多样、文化丰富多彩，许多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手段都有用武之地，往往能产生更多成果；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生生不息，许多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依然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民众对考古学具有亲切感和浓厚兴趣；等等。

新时代推动我国考古学更好发展，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古学研究的资料是实物，但这些实物资料除了诸如甲骨文、金文的文字资料，通常不能直接反映历史事实，大都需要考古工作者进行阐释。不同的人对同一资料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阐释。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考古为人民服务。学术无国界，学者有立场。考古学研究要以传承文明为己任，在一系列涉及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坚守底线，与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作坚决斗争。三是坚持考古学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学化，就要大力发展科技考古，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使考古研究手段更加科学化。推进国际化，就要树立全球视野，推动我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交流互动，并加大考古“走出去”的力度。推进大众化，就要通过举办公共考古讲座、开展考古研究成果的普及宣传等手段，让考古走进寻常百姓家。

新时代，我国考古学要发挥优势，在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提高我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上掌握更多学术话语权，努力把我国建成世界考古研究强国。

（作者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我国考古学具备更好发展的条件

王巍

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加强地域文化研究

邵汉明

不断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宝藏。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很早以前就是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形成的，其中包括平原、高原、山地、河谷、海域等不同自然地理空间。在这些地理空间内，人们发展出农耕、渔猎、游牧等不同经济形态，进而形成具有明显地域差别文化。西周分封之后，齐、楚、燕、晋、吴等处于不同地域的诸侯国，依据各自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基础，发展出既具有共同特点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秦汉以降，中华文化的格局不断扩展，内容也愈加丰富。直至近现代，地域文化一直在为中华文化这棵参天大树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当前，高铁、互联网等的发展虽然极大消除了不同自然地理空间之间的界限，不同地域文化也加速向具有同质特性的现代文化转化，但地域文化并没有消失，还在持续对当代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歌赋等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难以比拟的。历代连续不断积淀下来的文献资料成为当代地域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和丰厚底蕴。因此，地域文化研究无疑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值得学者们倾注心血，使之成为“中国话语”的重要来源、“中国故事”的重要元素。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地方文化研究，也不能与民族文化研究画等号，更不可将其与文化地理学等同，而是要突出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这样的地域文化研究，是通过历史、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宗教、考古、民俗、艺术等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深入分析中国各个地域文化的历史源流、丰富内容、人文特征和当代价值。换言之，当代地域文化研究要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于中华文化的真实、立体、全面展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

地域文化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着力。从地域文化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看，横向和纵向的研究都很重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一波接一波的地域文化研究热潮，大部分地域文化的纵向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和深入，但地域文化的横向研究还比较薄弱，对各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能很好地将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地域文化纳入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宏观研究格局中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和学术交流平台，不能将分布于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者组织起来，这限制了地域文化研究的发展空间。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成立全国性的地域文化研究会，把全国从事地域文化研究的学者组织起来，建设一支热心于地域文化研究、具有相当理论和学术水平的专业队伍，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人才支撑。二是依托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成立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和协调机构，协调全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布局和资源分配，最大限度地调动各地地域文化研究的积极性，推动地域文化研究健康发展。三是举办各种地域文化学术会议，为全国从事地域文化研究的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从而凝聚起全国地域文化研究力量，促进地域文化研究在更大平台、更高层次上实现繁荣发展。

（作者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史学智慧

——“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届年会”述要

涂芳芳

今年1月，习近平同志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为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贺信精神，统筹历史学研究资源，整合历史学研究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首届年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围绕整合历史学研究力量，研究规划我国历史学发展方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议题展开研讨。

与会者指出，做好新时代历史研究，推进我国历史学发展，应坚持以下三点：一是新时代历史研究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正确方向；二是新时代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以习近平同志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神为根本遵循，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发挥历史学传承文明、启迪未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三是新时代我国历史学发展必须以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为理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史学智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史蕴含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加强地域文化研究，拓展中华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在一定自然地理范围内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为当地人民所熟知和认同、带有地域文化符号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中华大地，多种多样的优秀地域文化一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地域文化历来是中华文化宏大画卷中的灿烂一页，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

